

流賊、清人殘毀明陵傳聞考辨

何冠彪*

根據不少清初史籍所說，流賊在進攻北京途中，曾焚毀昌平十二明陵；亦有傳聞記述，清人入關後，再次摧毀十二陵。這兩個說法雖然深入人心，流傳不已，但近日已有學者懷疑其可信性。就前者而言，有人認為流賊祇焚毀了定陵；有人則強調流賊未嘗焚毀十二陵。就後者言，論者普遍相信清人毀壞了定陵和德陵。本文就紛紜眾說，細加考辨，力證流賊入京途中，曾焚毀康、昭、定三陵；而清人入主後，僅破壞定陵而已。清人雖曾焚毀德陵，但此事發生於崇禎九年(1636)，即他們入主前八年。

關鍵詞：流賊 明陵 定陵 德陵 多爾袞

* 香港大學中文系

根據不少清代 (1644-1912) 史籍記載，流賊在進攻北京途中，曾焚毀十二明 (1368-1644) 陵。這個說法流傳了幾百年，近來雖有一、二學者提出懷疑，¹ 但相信的人仍然不少。² 其次，又有學者認為清人入京時，亦對明陵破壞甚大，比起流賊而言，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³ 本文擬針對有關說法，對流賊與清人殘毀明陵⁴ 問題作一考辨。

(一)

流賊焚毀十二陵的傳聞雖然廣泛記載於清初的史籍中，但有關傳聞詳略不同。綜合其內容，可歸納為三類：

¹ 顧誠 (1934-2003)，《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266-267，註4。伯驊，〈清毀明陵小考〉，收入燕山出版社（編），《京華古迹尋踪》（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頁111-114。

² 商傳，〈《明十三陵》〉（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頁23。謝敏聰，〈《中國歷代帝王陵寢考略》〉（修訂再版本，臺北：正中書局，1979），頁169。柳義南，〈《李自成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36。史松、林鐵鈞，〈《清史編年》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頁8。柳義南，〈《李自成新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331。孫文良、張杰，〈《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蕩》〉（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75。

³ 商傳，〈《明十三陵》〉，頁23。謝敏聰，〈《中國歷代帝王陵寢考略》〉，頁169-17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上冊，頁5。伯驊，〈清毀明陵小考〉，頁112-113。王德恒，〈《北京的皇陵與王墳》〉（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頁113。楊仕、岳南，〈《風雪定陵——地下玄宮洞開之謎》〉（修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31。王謙，〈《明定陵發掘紀實》〉，《黨史天地》2001.1：21。龐中威，〈《定陵發掘親歷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頁9。

⁴ 殘毀，摧殘毀壞之意。清人與近人曾用不同詞語描述流賊與清人對明十二陵的摧殘毀壞，本文用「殘毀」一詞，乃沿襲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6在位）〈湯泉行宮即事〉「昌平明代諸陵，久為流寇殘毀」的用語（見氏著，〈《御製詩五集》〉〔收入《清高宗【原注：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第8冊〕，卷三〇，葉22下，頁731）。用此詞描寫明陵受到破壞，顧炎武 (1613-1682) 〈孝陵圖〉亦有「陵衛多官軍，殘毀法不捕」之句（氏著，〈《亭林詩集》〉〔收入《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二，頁307），但他指的是南京的孝陵，不是北京的十二陵。至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則嘗以「殘毀」一詞為形容詞來描寫「明代諸陵」的破落狀況（詳註28）。

第一類的記載甚為簡略，祇說流賊於某日焚陵而已。例如，《國榷》說：

（崇禎十七年三月）甲辰（十六日），昌平陷，……賊焚十二陵。⁵

⁵ 談遷 (1594-1657)，《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第6冊，卷一〇〇，「甲申崇禎十七年三月甲辰」條，頁6040。按：關於流賊攻陷昌平的日期，大多數史著雖作三月十六日甲辰（詳正文），但亦有多種說法：

- （一）三月初七日。如吳履福等，《光緒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表五〉，葉11下謂：「三月乙未（七日），李自成陷昌平，……焚十二陵享殿。」（民國二十八年〔1939〕重刊光緒己卯〔五年，1879〕重修、丙戌〔十二年，1886〕刊成本）
- （二）三月十二日。如明翰林院修撰劉日升（?-1646）為於甲申之變殉國的左都御史李邦華（1581-1644）撰墓誌銘，便說：「三月九日寧武告急，大同、昌平三日繼陷。」（見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刻本影印本，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000，第81冊〕，〈墓誌銘〉，葉14下，頁346。按：《四庫禁燬書叢刊》扉頁謂《李忠肅公集》為「乾隆七年〔1742〕俞大坤刻本」，不確。因為集前載有金渭作於乾隆庚辰〔二十五年，1761〕的〈《李忠肅公奏議》序〉〔頁8〕。錢謙益（1582-1664），〈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李公神道碑〉亦說：「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收入氏著，《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下冊〕，卷三四，頁1206）程源（1643年進士），〈孤臣紀哭〉亦說：「十二日，賊至昌平，總兵李守鏢（?-1644）死之。昌平破時，賊乘勢直下。」（見馮夢龍〔1574-1646〕輯，《甲申紀事》，收入《馮夢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13冊〕，卷三，葉15下，頁184）
- （三）三月十二日陷，十六日上報。計六奇（1622-1687以後），《明季北略·十二昌平陷》下冊，卷二〇，頁448說：「庚子（十二日），賊破昌平州。」（北京：中華書局，1984）但同卷〈十六報賊焚十二陵〉，頁449說：「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表面看來，計六奇前後說法自相矛盾。但他在〈十六報賊焚十二陵〉之末，頁450解釋說：「他本載昌平十二破，李守鏢死。而《甲乙史》載十二李守鏢死，十六昌平陷。予謂十二殺守鏢，則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按：所謂「他本」，不知指何書；所謂《甲乙史》，或指江上外史（笪重光，1623-1692）的《甲乙史》（見謝國楨〔1901-1982〕，《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八，〈甲乙之際〉，頁369-370。據謝國楨指出，「此書恐已遭劫火」），筆者未見。但清初其他史籍中，不無相同記載的著作。如許重熙，《明季甲乙彙編》，即其一例。該書卷一，葉27上-28上，頁61-65記載：「庚子（十二日），……昌平總兵李守鏢自殺。……甲辰黎明，昌平陷。」（收入《晚明史料二種》，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計六奇的說法，有人採納。如無名氏，《燕都日記》本謂「十六日黎明，破昌平州，焚十二陵享殿」（見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卷六，葉3下，頁358）。莫釐山人增補馮書，在「庚子十二日」條下說：「陷昌平，總兵李守鏢死之（原注：原本註在十六日，下句增）。」在「甲辰十六日」條下則說：「報賊焚十二陵（原注：補）。」在條末更附計六奇評《甲乙史》之說（題馮夢龍原本、莫

《鹿樵紀聞》說：

甲辰，賊陷昌平，犯十二陵。⁶

釐山人增補，《燕都日記》〔與《青燐屑》合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頁42-43）。

（四）三月十三日。張廷玉（1672-1755）等，《明史·本紀二四·莊烈帝二》第2冊，卷二四，頁335雖謂：「甲辰，（賊）陷昌平。」（北京：中華書局，1974）但第26冊，卷三〇九，〈流賊傳·李自成〉，頁7964則說：「三月十三日焚昌平，總兵官李守鏐死。」傅衣凌（1911-1988）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頁459指：「三月十三日，李自成（1606-1645）占領了昌平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諒係根據《明史·流賊傳·李自成》。

（五）三月十五日。文秉（1609-1669），《烈皇小識》卷八，頁231-232說：「十五日癸卯，……聞賊至昌平，軍民爭降，總兵李守鏐力格殺數賊，賊攆刺之，乃拔刀自刎，……巡撫何謙（1631年進士）南奔。十六日，上御殿，召考選各官，問以治餉安民。……忽祕封呈進，覽之色變，即起入內，久之，諭各官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聞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享殿，悉行焚燬。」（與《研堂見聞雜錄》合刊，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6）

（六）三月十七日。趙士錦（1637年進士），《甲申紀事》，頁16-17記載「昌平降兵陳一元」的話說：「昌平巡撫何老爺（原注：即何謙）于大兵未至，十四日借守居庸之名出城。吾輩于十七早聞大兵至，稟李總爺守鏐……云：『吾兵只得去降。』總爺不肯。吾輩又云：『老爺雖不肯，吾輩去矣。』李回馬至門房，自縊。我兵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員在前迎接。劉老爺（原注：指宗敏〔？-1645〕）先至。吾輩跪云：『昌平守兵降。』劉老爺云：『聖駕在後。』須臾，皇爺（原注：指自成）至，跪降之。」（與《紀事略》等書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頁266，註3即據此謂：「大順軍占領昌平在三月十七日」；並懷疑前引《光緒昌平州志》所謂「三月乙未，李自成陷昌平」為「三月乙巳（十七日），李自成陷昌平」之誤。然而，陳一元所說的日期，甚有可疑。趙士錦在《甲申紀事》，頁7轉載陳一元的說話之前，亦曾引錄當時明朝的偵探隊長姚奇英記述流賊至昌平的日期，引錄如下：「三月十六日……午後，晤職方郎張正聲，予問偵探若何。正聲曰：『無確信。』予問大同若何。正聲云：『想已陷了。』……後予在賊營中，隊長姚奇英為予言：『初六破宣府，初十破陽和，十六早至居庸關，午間至昌平。』而京師茫然罔聞，良可浩嘆。」趙士錦當時任繕部郎，《甲申紀事》成於「甲申夏五」（頁1），而關於流賊何時至昌平，前後有二說，由此亦可見傳聞難據。

⁶ 題吳偉業（1607-1671），《鹿樵紀聞》（與《揚州十日記》等書合刊，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卷下，〈自成犯關〉，頁206。按：關於此書的作者問題，參看秦佩珩，〈《鹿樵紀聞》的作者及內容問題〉，《學術研究》1982.5：102；馮其庸、葉君遠，〈吳偉業《鹿樵紀聞》辨偽〉，附錄於氏著，《吳梅村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578-589。

《崇禎實錄》亦說：

甲辰，昌平陷，……賊焚十二陵。⁷

（按：清初記述明史的書籍汗牛充棟，因此祇舉三例，以省篇幅。下述分類舉例亦然。）

第二類則兼說陵內被焚的地方。如《流寇志》說：

甲辰十六，賊陷昌平州，……焚十二陵享殿。⁸

《石匱書後集》說：

十六日，賊陷昌平州，……焚十二陵享殿。⁹

《罪惟錄》亦說：

三月，……賊連陷昌平，縱焚十二陵享殿。¹⁰

第三類除說明毀陵日期和陵內被焚的地方外，兼記及陵木受到破壞。如〈再生紀畧〉說：

十六日，……日晡，賊犯十二陵，焚享廟，伐松柏。¹¹

《甲申傳信錄》說：

十六日，賊犯十二陵，焚亨（享）殿，伐松柏。¹²

⁷ 《崇禎實錄》（嘉業堂藏鈔本影印本，《明實錄附錄》之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卷一七，葉14上-下，頁539-540。

⁸ 彭孫貽（1615-1673），《流寇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卷九，頁155；又見氏著，《平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八，頁195。按：兩書是一是二，有爭論，參看謝伏琛、方福仁，〈《流寇志》與《平寇志》〉，見《流寇志·代前言》，頁1-9。

⁹ 張岱（1597-1680或1681），《石匱書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一，〈烈皇帝本紀〉，頁37。

¹⁰ 查繼佐（1601-1676），《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1冊，〈帝紀〉，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紀〉，頁384。

¹¹ 陳濟生（1644-1661），〈再生紀畧上〉，收入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卷四，葉6下-7上，頁230-231。按：有關流賊在十六日甚麼時間陷昌平和焚十二陵，有二說。一說在黎明，如註5所引《明季北略·十六報賊焚十二陵》和無名氏《燕都日記》，都是例子。另一說在日晡，除陳濟生〈再生紀畧上〉外，戴笠、吳爰，《懷陵流寇始末錄》卷一七，葉14下-15上，頁134-135亦說：「甲辰，昌平陷。……日晡，賊犯十二陵，焚享殿。」（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錢氏述古堂抄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42冊）

¹² 錢穀，《甲申傳信錄》（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卷一，〈崇禎十七年〉，頁13。

《明季遺聞》亦說：

甲辰日晡，賊犯十二陵，焚享廟，伐松柏。¹³

至於清代後期史籍所載流賊焚毀明陵的情況，大致亦不出上述三類。如《明通鑑》說：

甲辰，（賊）陷昌平，焚十二陵。¹⁴

即與第一類同。《甲申朝事小紀》說：

甲申三月十六日甲辰，賊陷昌平州，……焚十二陵享殿。¹⁵

即與第二類同。《小腆紀年附考》說：

十二日，聞賊陷明昌平州，……遂焚十二陵享殿，伐松柏。¹⁶

即與第三類同。

流賊毀陵的傳聞，不獨在漢人的著述中流傳，就是清朝的君主，亦侃侃而談其事。如弘曆重修明陵時，便說：

昌平明代諸陵，久為流寇殘毀。¹⁷

¹³ 鄒漪（1615-？），《明季遺聞》（北京圖書館藏順治〔1644-1661〕刻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第442冊），卷一，〈北都〉，葉34上，頁600。

¹⁴ 夏燮（1799-1875），《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4冊，卷九〇，〈莊烈崇禎十七年〉，頁3462。

¹⁵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初編〉，卷六，〈三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大事草紀〉，頁153。按：〈二編〉，卷五，〈丁丑以後佚事摘記〉，頁351說法同，文字稍有出入。

¹⁶ 徐鼎（1810-1862），《小腆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上冊，卷三，「清世祖順治元年三月」條，頁90。

¹⁷ 《御製詩五集》卷三〇，〈湯泉行宮即事〉，葉22下，頁731。按：據書中編年，此詩作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弘曆下令重修明陵，乃在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第12冊，「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五日」條，頁506-507。又見慶桂（1735-1816）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第16冊，卷一二二六，「朝隆五十年三月癸丑」條，頁433-434。有關弘曆重修明陵一事，謝敏聰，《中國歷代帝王陵寢考略》，頁170說：「乾隆時為緩和明代遺老之敵視，便重修明陵。」龐中威，《定陵發掘親歷記》，頁9亦謂：「到了清乾隆的時候，為了緩和明代遺老們對他們的敵視，便提出來重新修繕明代的陵寢。」然而，乾隆五十年上距明亡一百四十多年，何來尚有明遺老？至於重修明陵的經過與諸陵重修後的規制變遷，參看胡漢生，《明十三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頁130-141；〈清乾隆年間修葺明十三陵遺址考證——兼論各陵明樓、殿廡原有形制〉，收入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首屆明代帝王陵寢研討會、首屆居庸關長城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64-

又說：

明諸陵……經流賊兵燹之後，殿宇多就傾圮，不獨龕帳全無，並神位亦俱遺失，實不堪入目。¹⁸

不過，弘曆沒有指明「爲流寇殘毀」的是否全部十二陵。

(二)

雖然清代史籍中記載流賊焚毀明陵之事相當簡略，近人轉述有關記載時，卻衍生出不同的內容。如伯驊，〈清毀明陵小考〉說：

明末私家書中，……有李自成向北京進軍途中焚毀了明陵的享殿，砍伐了陵上的松柏，「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之說。¹⁹

伯驊沒有注明所指何書，但根據上文的分類，他所指的分明屬第三類史籍。但是，如果我們查翻這些史籍，便會發覺所謂「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八字，並不是記載流賊焚毀明陵的情況。現以《明季北略》爲例：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²⁰

72。又有關明陵原有規制，另參胡漢生，《明十三陵》(1998)，頁42-51，109-126；《明十三陵大觀》(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明十三陵陵寢建置表(原注：清乾隆改建前情況)〉，頁213-216(按：該表又見氏著，《明十三陵》[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188-189)。

¹⁸《御製詩五集》卷一六，〈哀明陵三十韻〉詩中注，葉25下，頁478。

¹⁹伯驊，〈清毀明陵小考〉，頁111。

²⁰《明季北略》下冊，卷二〇，〈十六報賊焚十二陵〉，頁449。按：「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乃流賊犯平則門情況，廣泛見於清初人的記載中，以上文所引諸書為例，有《燕都日記》(見註5)、《甲申傳信錄》(卷一，〈崇禎十七年〉，頁13。按：錢穀的原文是：「直犯阜城門，終夜焚掠，火光燭天。」平則門為阜城門的俗稱，見劉若愚[1584-約1642]，《酌中志》，收入《海山仙館叢書》，道光乙巳[二十五年，1845]刊本，卷一六，〈內臣職掌紀畧·京城內外十六門〉，葉51上。但《懷陵流寇始終錄》記載此事，誤為「阜終門」，又所用詞句為「終夜火光燭天」[卷一七，葉14下-15上，頁134-135])、《明季遺聞》(卷一，〈北都〉，葉34上，頁600。按：鄒漪將平則門作「平子門」。懶道人，《李闖小史》卷一，頁103亦作「平子門」，但所用詞句為「恣行焚掠，火焰漫天，砲聲不絕」[與《甲申核真略》等書合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此外尚見於谷應泰(1620-1690)，《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4冊，卷七九，〈甲申之變〉，頁1378。

由此可見，「竟夜焚掠，火光燭天」是流賊進攻平則門的景象，與焚燒明陵沒有關係。

另有一種近似的說法見於楊仕、岳南，《風雪定陵——地下玄宮洞開之謎》，節錄如下：

據史料記載，……李自成率大軍逼近京城，……十三陵被起義軍攻下。李自成下令焚毀十三陵大殿，搗毀定陵、慶陵、德陵宮牆與宮門，整個十三陵「碑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絕」。²¹

由於作者沒有注明所據史料為何，此說的來源，有待稽考。

此外，有「民間傳說」指「李自成燒十三陵」之說不對，因為李自成祇燒掉了十二陵的大殿，沒有燒掉長陵大殿。龐中威是發掘定陵時第一個下探地宮的人，他的《定陵發掘親歷記》提及一九五七年他在長陵村時，一個老先生告訴他以下的傳聞：

據說李自成攻北京時，先攻下昌平州，他和他的親兵就住在這個大殿裏，所以這個大殿沒被李自成燒掉。李自成攻下北京時，這裏仍然有李自成的軍隊住著，這個大殿就留下來了，其他陵的大殿都給燒掉了。²²

剛好相反，伯驊在〈清毀明陵小考〉中，力主在「十三陵」中祇有定陵一處為流賊焚毀。他說：

根據清初時一些明代遺民所記，十三陵中享殿被毀的只有定陵一處，……十三陵地上建築被焚毀的要為定陵享殿。²³

最後，陳懷仁、夏玉潤在〈試析明皇陵的特點〉更認為流賊未嘗焚毀「十三陵」。他們說：

在17座明陵中，僅（鳳陽）皇陵被明末農民軍焚毀。²⁴

²¹ 楊仕、岳南，《風雪定陵》，頁31。按：此說從何而來，書中未有注明。即使翻閱該書參考書目中所列書籍和文章，亦發現不到有關說法。無論如何，作者為「碑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絕」兩句加上引號，當是所據史料原文，不是作者自己的文字。除《風雪定陵》一書外，王謙〈明定陵發掘紀實〉，頁21亦記載：「明末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逼近京城時，從柳溝入德勝門，攻下十三陵，焚燒了十三陵大殿，搗毀了定陵、慶陵、德陵城牆與城門，整個十三陵，『碑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絕。』」可是，王文同樣沒有注明出處。畢竟，王文後出，相信文中所言乃抄摘自《風雪定陵》（按：原書1991年由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²² 龐中威，《定陵發掘親歷記》，頁84。

²³ 伯驊，〈清毀明陵小考〉，頁111, 114。

²⁴ 陳懷仁、夏玉潤，〈試析明皇陵的特點〉，收入《首屆明代帝王陵寢研討會、首屆居庸

流賊究竟焚毀了多少明陵，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留待下一節詳細討論。然而，上述近人的說法顯然有先天性的毛病。誠然，當流賊攻陷昌平時，明朝還未滅亡，朱由檢還未自縊，清人尚未入關，思陵尚未營造，何來「十三陵」？

(三)

儘管流賊焚毀明陵的說法至今仍有人徵引，但早在清初已經有人懷疑有關史籍的記載失實，可惜不為人注意而已。例如，萬經（1659-1741）就曾對這個說法，提出反駁：

國史綜其大綱，野史補其缺略，然傳聞失實，不可盡信則一也。如《勝國愍帝遺錄》載：「十七年三月甲辰，李自成陷昌平，毀十二陵。」余核之，實止昭、定二陵。……夫有明事，其近者也，猶難信如此，況其遠者乎！²⁵

萬經所謂「核之實」，可能是指他曾往十二陵核實。²⁶ 事實上，在順治、康熙（1662-1722）年間，有不少明遺民和其他人士曾途經昌平或往昌平謁明陵，並且記載了他們的所見所聞。這些記載，固有助後人理解當時明陵的損壞程度，但令人困惑的是，這些記載的出入頗多。以下按有關記載的時序，略述一二。

談遷在順治十一年（1654）八月己未（初二日）謁思陵之後，「取故道反」，沒有到過十二陵。但他從在順治二年（1645）開始守思陵的「許氏闖」打探十二陵的情況。「許氏闖」謂「各陵無恙」，祇是「陵木盡伐，享殿不閉，綺疏藻井，百一不全，洩渤接於几筵」。²⁷ 至於福臨在順治十六年（1660）十一

關長城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28。參看註99。

²⁵ 萬經，〈《南宋雜事詩》序〉，收入沈嘉祿（?-1733）、吳焯（1676-1733）、厲鶚（1692-1752）等，《南宋雜事詩》（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萬經序〉，頁2。

²⁶ 萬經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抵京師參加會試，「是歲留館京師」（見氏著，〈《歷代紀元彙考》識〉，收入萬斯同〔1638-1702〕，《歷代紀元彙考》〔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該識，葉1上）。如果萬經曾謁明陵，不能早於此年。全祖望（1705-1755），《鮚埼亭集》上冊，卷一六，〈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頁301謂萬經「嘗自葦年譜」（收入《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缺錄，或已散佚。

²⁷ 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紀郵上〉，頁68-70。

月，「巡幸畿輔，道經昌平」時所見到「明代諸陵」的模樣是：

明代諸陵，殿宇牆垣傾圮已甚，近陵樹木多被斫伐。²⁸

談遷所記，固為道聽塗說；福臨所見，亦係遙目遠覽，對我們考辨流賊焚毀十二陵說，幫助不大。若要進一步了解明陵殘毀的情況，必須檢視親謁陵者的紀錄。

顧炎武從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六謁天壽山十三陵，²⁹以抒發眷念故國的情懷，並且寫下不少詩篇，記述他的所見、所聞和所感。其中在順治十六年寫的〈恭謁天壽山十三陵〉，便記錄明陵毀壞的狀況如下：

康、昭二明樓，並遭劫火亡。定陵毀大殿，以及東西廊。餘陵半無門，累甃仍支宗。尚存宰牲亭，暨外諸監房。³⁰

此外，他在《昌平山水記》中，對明陵毀壞的狀況，有更詳細的描述：

²⁸ 巴泰（?-1690）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卷一三〇，「順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條，頁1006。按：有鑑於明陵殘毀，福臨諭令工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見存樹木，永禁樵採。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又命工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閱，勿致疎虞。」然而，福臨此舉，顧炎武並不欣賞，他在「上章困敦（即順治十七年庚子）」作的〈再謁天壽山陵〉說：「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小修此陵園，大屑我社稷。」（《亭林詩集》卷三，頁346）又按：福臨此諭，後人或誤其年月。例如，于敏中（1714-1779）等，《欽定日下舊聞考》第7冊，卷一三六，〈京畿·昌平州三〉，頁2185不注年月，祇說是「世祖章皇帝諭工部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周家楣（1835-1887）等，《光緒順天府志》第3冊，卷二六，〈地理志八·冢墓〉，頁867以此為「順治四年（1647）四月諭工部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光緒昌平縣志》卷一，〈皇德記〉，葉2上又謂此敕為順治八年（1651）敕，皆誤。順治四年四月可能另有與明陵相關的諭工部敕，《欽定日下舊聞考》第7冊，卷一三六，〈京畿·昌平州三〉，頁2185說：「昌平州之天壽山明代十三陵，皆在其地，本朝順治四年夏四月，世祖章皇帝特命工部修葺。」不過，《世祖章皇帝實錄》沒有提及此事。

²⁹ 參看沈嘉榮，《顧炎武論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頁87-93。

³⁰ 《亭林詩集》卷三，頁342。按：此詩作於「屠維大淵獻」（同上，頁338），即順治十六年己亥。又顧炎武謁十三陵諸詩，朱孔陽嘗輯錄，收入《歷代陵寢備考》（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卷五〇，葉13上-17上，頁350-352。但顧炎武另有〈謁橫宮文〉四篇（見《亭林文集》〔收入《顧亭林詩文集》〕，卷五，頁120-121），則未見輯錄。

	陵別	引文
1	長陵	舊有樹，今亡。
2	茂陵以 外諸陵	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冀虞（虞）之屬，猶有存焉。
3	康陵	明樓為賊所焚。
4	永陵	舊有樹，今亡。
5	昭陵	明樓為賊所焚，樹亡。
6	定陵	殿廡門為賊所焚，樹亡。 ³¹

但是，除第3、5、6項外，顧炎武沒有指明誰是破壞者。即使是第5、6項中的「樹亡」是否指因賊而亡，亦難確定。³² 無論如何，綜合〈恭謁天壽山十三陵〉和《昌平山水記》，十二陵中祇有康、昭、定三陵曾為流賊所焚，長、永、昭、定四陵的陵木不存，以及茂陵以外十一陵的設備殘闕而已。

另一遺民屈大均（1630-1696）在康熙七年（1668）八月「攜家自代州北行，至昌平州，謁長陵以下諸陵，遂入京」。³³ 他當時寫了〈自代北入京記〉一文，提及明陵的景象如下：

山童童，樹木皆盡，惟景陵寶城前，有白松四株，冢上一株。……定陵全燬於賊，昭陵、康陵僅明樓被焚。泰陵殿上存御座、案榻各一，及承塵五

³¹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與《京東考古錄》合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卷上，頁6-9。按：劉仁甫，《前明十三陵始末記》對十三陵的記述，與正文所引《昌平山水記》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顯然是抄摘自顧炎武此記，但他記載定陵時則說：「寶城及殿廡門俱焚，樹亡。」（民國四年〔1915〕刊本，頁17）則與顧說不同。但劉氏所說不確，因為定陵的寶城並沒有被焚毀，詳下引《帝陵圖說》和〈十三陵記〉的記載。又按：《前明十三陵始末記》一書承南開大學鄭克晟教授及孫衛國教授為我影得，謹此致謝！

³² 顧炎武固未有說明陵木因何而亡，但在順治十六年十一月道經明陵的福臨，則把「近陵樹木多被所伐」，說成是「向來守護未周」所致（《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三〇，「順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條，頁1006）。據記載，福臨曾於順治九年（1652），「敕禁明陵樵採」（《欽定四庫全書》第7冊，卷一三六，〈京畿·昌平州三〉，頁2184；《光緒昌平縣志》卷一，〈皇德記〉，葉1上）。

³³ 汪宗衍（1908-1993），《屈翁山先生年譜》（澳門：于今書屋，1970），「永曆二十二年、康熙七年戊申、三十九歲」條，頁90。

色天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爐之屬，或完或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為之眩。³⁴

此外，他在〈天壽八首〉第四首末注說：

諸陵樹木皆盡，惟景陵餘白松數株。³⁵

又在最後一首的頭聯說：

風雨昭陵落葉悲，園門久已壞罍窰。³⁶

比對顧炎武和屈大均的記述，十二陵的殘毀程度已有不同，陵木的存亡情況，差異更大。至於清朝官員趙吉士（1628-1706）於康熙十四年（1675）冬訪覽十三陵，并作了〈十三陵九詠〉，而其筆下的陵木存亡與建築殘毀記載，更出人意表。關於陵木的存亡，趙吉士在〈十三陵九詠〉之二「止見茂陵多古木」句注說：

成化（明憲宗朱見深，1447-1487，1464-1487在位）茂陵松栢獨存。³⁷

至於建築的殘毀，第五首尾聯所述如下：

太息定陵遭劫火（原注：十三陵惟萬曆〔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1572-1620在位〕定陵被毀），止留斷碣卧荒藤。³⁸

撇開陵木不談，顧炎武和屈大均指定、昭、康三陵被焚毀，萬經卻謂被毀的「實止昭、定二陵」，趙吉士更說「惟萬曆定陵被毀」。三人謁陵的時間相近，上述矛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然而，在諸說當中，即使趙說也不孤立。例如，黃宗羲（1610-1695）的兒子黃百家（1643-1709）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謁陵，後來追憶此事，便有這樣的記載：

³⁴ 屈大均，《翁山文外》（收入《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第1冊），卷一，頁25。

³⁵ 屈大均，《翁山詩外》（收入《屈大均全集》第3冊），卷一〇，頁805。

³⁶ 同上，頁806。

³⁷ 趙吉士，《萬青閣自訂詩》（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青閣全集》清刻本），卷三，葉117下。按：趙吉士當時為戶部山西司主事。參看朱彝尊（1629-1709），〈朝議大夫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墓誌銘〉，見氏著，《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卷七七，葉2上。

³⁸ 《萬青閣自訂詩》卷三，葉118上。按：趙吉士沒有說誰毀定陵，惟龍顧山人（郭則澐，1882-1946）引趙詩，則謂「定陵毀於寇亂」。又他引趙詩時說：「趙吉士（原注：恒夫）謁明陵詩云。」惟標點者不察，誤以「謁明陵」為詩題。見氏著，《十朝詩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卷二，〈明陵詩〉，頁35。

百家嘗於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九月謁天壽諸陵，獨定陵之祿恩殿遭毀，碑亭冥樓在焉。³⁹

因此，若要確定有多少陵被焚毀以及陵毀的程度，還需再加探索。

就目前所知，梁份（1641-1729）的《帝陵圖說》是清初記載十三陵最詳細的著作。⁴⁰ 康熙四十二年（1703），梁份和黃曰瑚「徒步往謁」十三陵，「份爲圖說，曰瑚步跬形勢，規制遠近，吉凶無不載」。⁴¹ 換言之，《帝陵圖說》是梁份和黃曰瑚爲十三陵所作的實地勘察紀錄。

在《帝陵圖說》中，梁份記載諸陵的殘闕情況如下：

陵別		引文
茂陵	祿恩門	門以內左神廚、右神庫各五椽，今圯且過半。 ⁴²
康陵	祿恩門	門內左神廚、右神庫各五椽，今棟宇圯陟，城陞頽敗矣。丹墀中左、右神帛爐二，今圯且盡。
	明樓	樓為賊焚毀盡矣。……樓中烈焰所餘，斷瓦頽垣，瓮門四闢之半壁而已。 ⁴³
永陵	祿恩門	丹墀中左、右神帛爐各二爐，今圯。 ⁴⁴

³⁹ 見黃宗義（編），《明文授讀》（康熙三十六年〔1697〕張錫琨味芹堂刻本影印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401冊），卷四三，〈博士松源楊公七十壽序〉附黃百家按語，葉14下，頁346。

⁴⁰ 在十三陵的歷史文獻中，《帝陵圖說》與《昌平山水記》備受推崇，被譽為「各有特色的『雙璧』」。見胡漢生，《明十三陵》（1998），頁378。

⁴¹ 王源（1648-1710），〈十三陵記下〉，收入氏著，《居業堂文集》（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讀雪山房藏板本），卷一九，葉3上。

⁴² 梁份，《帝陵圖說》（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卷二，〈茂陵〉，葉數缺。按：胡漢生，〈清朝隆年間修葺明十三陵遺址考證〉，頁72註1指「《帝陵圖說》記康熙年間仍處於倒塌、殘壞的建築」中有「茂陵的左右配殿」，疑誤。又按：《帝陵圖說》一書承南京大學史梅女士為我影得，謹此致謝！

⁴³ 《帝陵圖說》卷二，〈康陵〉，葉數缺。

⁴⁴ 同上，〈永陵〉，葉數缺。

昭陵	祿恩門	丹墀中左、右神帛爐各二，今半圯。
	祿恩殿	「歲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不戒于火，焚毀無存，存瓦礫耳。當赤眉之寇、滄海之塵，而殿煥然，棟宇巍然。何剩水殘山，四方無虞，而祝融不仁而丘墟之，不使一椽片瓦遺于更代。」又殿後西北石供案上的石供器，「毀壞過半」。
	明樓	延燒盡矣。祿恩殿不戒于火，而樓已先災灰燼瓦礫中。 ⁴⁵
定陵	定陵碑亭、神宮監、宰牲亭、祠祭署 ⁴⁶	定陵碑亭，……梁椽之堅固，砌石之重厚，天壽諸陵不及也。崇禎甲申，國步既蹙，寢廟震驚，乞師破賊，賊已破而七大恨之故，先雪怨于神廟矣。亭之木瓦于是毀之且盡，唯琢石柱礎如故也。……亭東三百趨神宮監，故趨三百餘椽，斷瓦殘垣，歷歷可見，監西北二百趨則宰牲亭、祠祭署，基石柱礎無可別。免葵燕麥中得碎黃黑瓦，而知若為亭，若為監、署而已耳。
	祿恩殿門	定陵門，陵寢之第一門也，……甲申之變，寸寸毀之而不能盡毀也。左右廊廡各五間俱毀，階三道依然存也。……定陵重門，陵寢之第二門也，……牆垣簷瓦，甲申之毀亦如第一門矣。……祿恩門，定陵享殿之第三門也，披灌莽、撥瓦塊，今猶見故蹟焉。……門以內左右廊各九間，今俱毀。
	祿恩殿	祿恩殿，殿今已矣，瓦石中尋舊基，凡七楹。……殿後西北有石坊，今存二柱。坊左右有掖門、有曲巷，左右折一。
	寶城、明樓	城無甃門，……拾級上明樓，塚上童然。……崇禎甲申，會際時艱，毀之不能毀也，焚之不能焚也，……唯此樓此城，歷陽九陰六而不壞者。 ⁴⁷
德陵		祿恩門……棟桷今欲崩折，諸陵歷年久且不若是也。……神帛爐左右各二，今圯一。 ⁴⁸

⁴⁵ 同上，〈昭陵〉，葉數缺。按：梁份強調祿恩殿「當赤眉之寇、滄海之塵，而殿煥然，棟宇巍然」，但明樓則「已先災灰燼瓦礫中」。換言之，他認為明樓是毀於流賊之手。

⁴⁶ 從右文可見，定陵碑亭等建築物雖受過重創，但梁份暗指是清人入關時所為，而非由流賊所造成。

⁴⁷ 同上，〈定陵〉，葉數缺。

⁴⁸ 同上，〈德陵〉，葉數缺。

《帝陵圖說》以外，梁份友人王源的〈十三陵記〉也是研究明陵不可或缺的歷史文獻。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三日，王源與梁份的兒子文中過昌平，次日登天壽山，二十七日歸，其間遍謁明陵，並於事後立即寫成〈十三陵記〉上、下篇。⁴⁹ 據下篇所載，諸陵殘毀的情況如下：

	陵別	引文
1	獻陵	牆裂階圯。
2	泰陵	泰之祔恩門燬而復脩者，只一中門，高數尺而已。
3	康陵	明樓不知何時燬頽，垣碑斷裂，荒荒無復諸陵之觀。
4	定陵	大門內剝碣滌滌，而繚垣遺址，殘石斷瓦。……不能毀者，寶城、明樓也。……荊榛悽然，瓦礫靡然，而明樓巋然，彩光煥然。……門外碑亭，僅存其垣。若宰牲亭、神宮監，無一椽一瓦之存矣。
5	昭陵	「稍存松柏，但祔恩殿、明樓俱燬。」據陵戶指出，祔恩殿是在康熙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夜晚大雨中，「忽雷震，殿火不可救，……只救得兩廡存耳」。至於「明樓毀於前，不記何時」。
6	茂陵以外諸陵	聞昔林樹數十萬株，變後翦伐無遺，犁為田。獨茂陵如故。他陵不但松柏無存，其不存者多矣。 ⁵⁰

除第5、6兩項外，王源沒有提及第1至4項損壞於何時造成。即使是第5項，明樓亦不知毀於何時。第6項雖謂「變後」，但亦未指出是誰所為。所以，從整體上說，〈十三陵記〉的記載始終是不及《帝陵圖說》的。

儘管上引著述所載流賊殘毀明陵的內容頗有出入，但歸納其內容，我們仍可以肯定，流賊不是沒有殘毀昌平明陵，但他們不是盡毀十二陵，也不是獨毀定陵，⁵¹ 充其量他們焚毀了康陵、昭陵和定陵而已。當然，所謂焚毀，不是說將全

⁴⁹ 〈十三陵記下〉，葉3上，6下。

⁵⁰ 同上，葉4下-5上。

⁵¹ 見伯驊，〈清毀明陵小考〉，頁111，114。伯驊指其「十三陵地上建築被焚毀的要為定陵享殿」的結論，來自「顧炎武、梁份、王源諸人在康熙年間身經目睹者」，但本文所引諸人的記載，根本與這個結論不甚脛合。事實上，伯驊祇徵引了顧炎武的〈恭謁天壽山十三陵〉及梁份《帝陵圖說》關於定陵的其中一段而已，他始終沒有引錄王源的著作。其次，從他稱「梁份《帝陵圖說》、王源《十三陵記》二書」一語推測，他根本就不知道〈十三陵記〉為上、下兩篇文章。又從南京圖書館藏的《帝陵圖說》所見，〈十三陵記〉亦附載於《帝陵圖說》內，不過沒有注明為王源所作而已。

陵化為灰燼，而是指陵內部分建築物被燒掉了。還要指出，由於定陵先後受到流賊和清人殘毀，那一部分為流賊所破壞？那一部分為清人所破壞？其實是難以知道的。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說：

被義軍燒毀的康、昭、定三陵在西邊，其他九陵在東邊，也許能說明義軍當時行經的路途。⁵²

顧誠之說很有見地。誠然，明陵陵區南距北京約五十公里，面積達一百二十餘平方公里，何況諸陵坐落在東、西、北三面的山麓之上，⁵³ 當時流賊正全速進攻北京，不可能停留在陵區四處破壞，他們祇可能在途經的陵寢進行破壞。但必須指出的是，他們雖然祇有焚燒康、昭、定三陵，但在途經之處所作的破壞亦不能忽視。

(四)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1661-1722在位）曾對他的兒子說：

世祖章皇帝初進北京，明朝諸陵，一毫未動。⁵⁴

可是，近人則認為清人入關時，曾大肆破壞明陵。現按著作年代的先後次序，舉例如下：

謝敏聰，《中國歷代帝王陵寢考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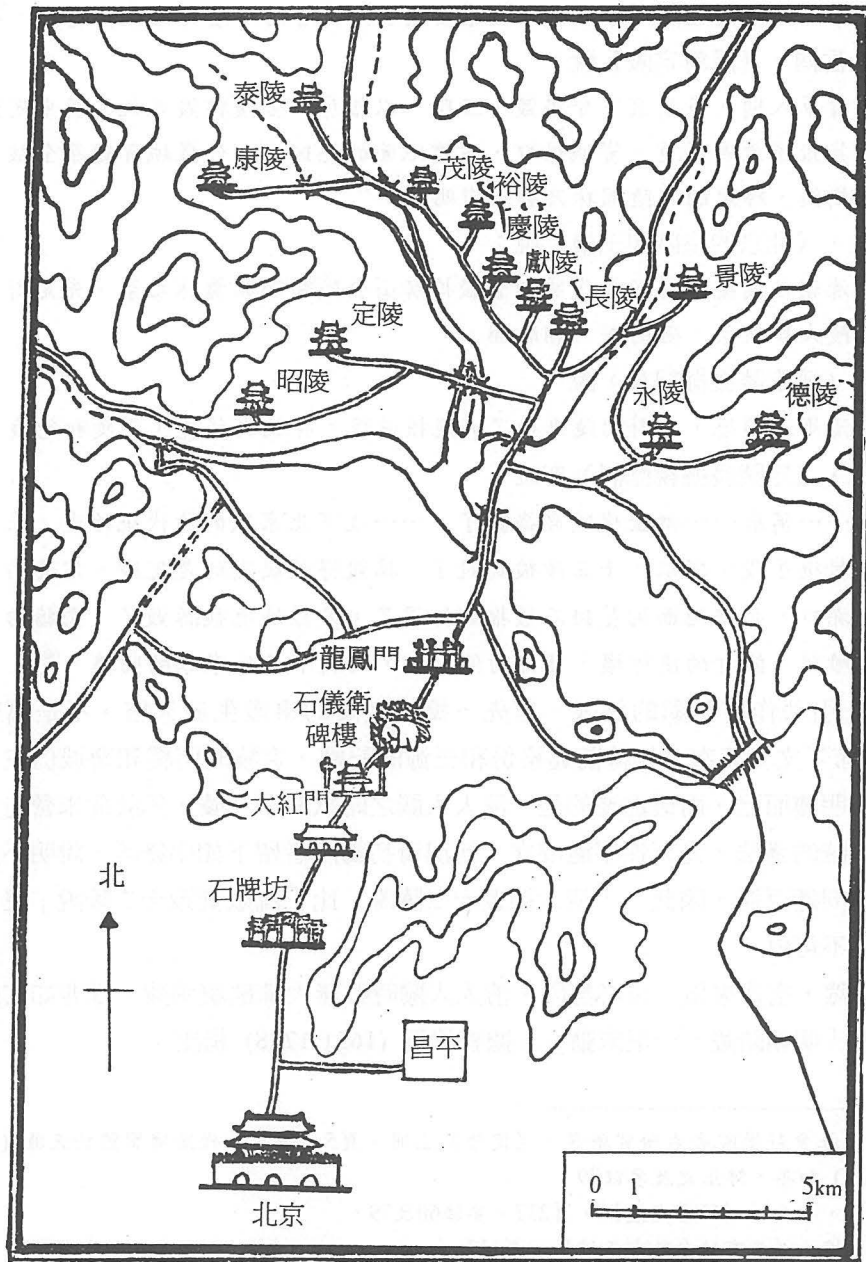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入京焚十二陵宮寢，破壞最烈的就是定陵。清兵入關，採取報復明人毀大房山的金陵，……於是再毀明陵——受破壞最烈仍為定陵。定陵的寶城垛口、明樓地面的花斑石被推翻打壞了，外羅城也被拆毀了，圍牆的磚石雕刻，能打的便打壞，可拆的便拆毀。只剩下了明樓。⁵⁵

⁵²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頁267，註4。

⁵³ 胡漢生，《明十三陵大觀》，頁3。茲附該書頁2所載的「十三陵分布圖」改訂為「十二陵分布圖」，附於本節之末，以見諸陵的分布情況。

⁵⁴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1735，1722-1735在位），《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717冊），葉54上，頁642。

⁵⁵ 謝敏聰，《中國歷代帝王陵寢考略》，頁169-170。按：明人毀大房山金陵一事，詳正文。



十二陵分布圖（據胡漢生，《明十三陵大觀》改訂）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著的《定陵》說：

萬曆末年，……派人將金陵搗毀。……滿洲部族進關之後，為報毀陵之恨，對明陵也進行了破壞，破壞最甚者是萬曆的定陵與天啟的德陵。⁵⁶

楊仕、岳南，《風雪定陵》說：

清軍入關，多爾袞下令搗毀十三陵，以報房山金陵被毀之仇。其中定陵遭其毀壞最為嚴重，寶城垛口、明樓地面的花斑石、外羅城等建築全被焚燒搗毀，輝煌的定陵園林只剩一座明樓。⁵⁷

王德恒，《北京的皇陵與王墳》說：

清朝入關後，為了報復明朝曾毀掉房山金陵斷滿族龍脉之舉，先是對十三陵大肆破壞，砸的砸，翻的翻。⁵⁸

王謙，〈明定陵發掘紀實〉說：

清軍入關後，又對明陵進行了大規模破壞，並放火焚燒了定陵和德陵。⁵⁹

龐中威，《定陵發掘親歷記》亦說：

……萬曆……把金代陵寢搗毀了。……攻下北京城的清代統治者，采取了報復手段，所以，十三陵被搗毀了，搗毀得最厲害的是定陵。定陵的寶城垛口、明樓地面的花斑石被推翻打壞了，外羅城也被拆毀了，圍牆的磚石雕刻，能打的便打壞，可拆的便拆毀，只剩下了孤零零的明樓。⁶⁰

上引著作有明顯的錯誤。首先，搗毀金陵的事發生於天啟，不是萬曆。（詳本節下文）其次，根據前述梁份和王源的記載，定陵的明樓和寶城仍在，不是剩下明樓而已。而最重要的是，清人入關之時祇有十二陵，思陵尚未營造，搗毀十三陵的講法，先天性不能成立。何況清初謁陵者留下如山鐵證，說明不是所有陵寢同遭厄運。因此，「清人搗毀十三陵說」比「流賊焚毀十二陵說」更多破綻，更不可信。

誠然，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清人入關時雖無大肆破壞明陵，卻非如玄燁所說，對「明朝諸陵，一毫未動」。據查慎行（1651-1728）指出：

⁵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冊，頁5。按：金代陵寢實毀於天啟（1621-1627）初年，詳正文及參註79。

⁵⁷ 楊仕、岳南，《風雪定陵》，頁237。參註60及79。

⁵⁸ 王德恒，《北京的皇陵與王墳》，頁113。

⁵⁹ 王謙，〈明定陵發掘紀實〉，頁21。

⁶⁰ 龐中威，《定陵發掘親歷記》，頁9。按：萬曆朝未曾搗毀金代陵寢，此書所說，顯然誤據楊仕、岳南，《風雪定陵》。參註79。

本朝入關，惟定陵獨被毀，餘仍令太監守護。⁶¹

梁份亦暗示清人曾毀定陵。他說：

崇禎甲申，國步既蹙，寢廟震驚，乞師破賊，賊已破而七大恨之故，先雪怨于神廟矣。亭之木瓦于是毀之且盡，唯琢石柱礎如故也。⁶²

至於王源兩番慨歎在十二陵中「莫慘於定陵」，⁶³亦不外隱約其詞，道出定陵先毀於流賊，再毀於清人的慘變。

清人為何獨毀定陵？陵毀於何時？誰主使毀陵？凡此問題，都必須探討。但是，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要檢視順治一朝對待明陵——特別是定陵——的政策，才有利於找到答案。

順治元年（1644）七月，清廷應原任司禮監掌印太監曹化淳等五名太監的請求，准設長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內員各四人。⁶⁴八月，「設故明十三陵司香官及陵戶，給以香火地畝，仍諭以虔潔禋祀，禁止樵牧，用稱國家隆禮前朝至意」。⁶⁵十月，福臨「頒即位詔於天下」，詔內臚列「所有合行條例」，其中一條例包括以下內容：

明國諸陵，仍用內員及陵戶看守，撥給香火地土，仍春秋致祭。⁶⁶

可是，到了十一月，清廷突然撤去定陵的宦官和守戶，亦不予春秋二祭。《世祖章皇帝實錄》說：

⁶¹ 查慎行，《人海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明朝諸陵〉，頁20。

⁶² 《帝陵圖說》卷二，〈定陵〉，葉數缺。

⁶³ 〈十三陵記下〉，葉5下，7上。

⁶⁴ 〈原任司禮監掌印太監曹化淳等啟本〉，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第3本，葉222上。按：所謂長陵以下十四陵，乃指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和景皇陵。《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六，「順治元年七月庚子」條，頁68說：「設故明長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內使各四人」，乃指此事。但是清廷正式設官，實在八月（詳下註）。又嵇璜（1711-1794）等，《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二〇，〈群廟考二·歷代帝王陵〉，頁5893說：「順治元年……七月，設明長陵以下十二陵司香內使各四人」（收入《十通》〔臺北：新興書局，1965〕，第19冊），不確。至嵇璜（等），《皇朝通典》卷四，〈禮·吉九·祀·歷代帝王〉，頁2317謂：「順治元年五月，……詔明十二陵……設司香官及陵戶，給以香火地畝」（收入《十通》第3冊），則月份與陵數皆不確。

⁶⁵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七，「順治元年八月癸未」條，頁82。按：在〈原任司禮監掌印太監曹化淳等啟本〉後附「硃批」說：「每陵准設內員四人，其守陵人戶併香火地土，還著禮部議妥來說。」但正式設員時祇說十三陵，因為不包括景皇陵，參看註69正文。

⁶⁶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九，「順治元年十月甲子」條，頁94-95。

先是設看守故明十三陵，每陵夫二十四名、田二十二頃。至是定制：除萬歷陵不設外，其十二陵，各設太監二名、夫八名，照役給田，仍命戶部量給歲時祭品。⁶⁷

至於為何裁撤，當時並沒有交代。不過，當時由睿親王多爾袞（1612-1650）攝政，有關改變自然由他決定。及福臨親政⁶⁸ 半年後，上述苛待定陵的政策便出現變化。

順治八年六月，福臨下諭禮部，更改順治元年十一月所定苛待定陵的政策。論文說：

順治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寢併祭典，因神宗與我朝有嫌，故裁之。朕思前朝帝王陵寢，理宜防護，況我朝凡事俱從寬厚。今神宗陵著照故明十二陵例，以時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守，即著遵行。⁶⁹

儘管論中指出從前裁撤定陵的守護和祭典是「因神宗與我朝有嫌」，始終是語焉不詳，使人難明究竟。其次，所謂為定陵「以時致祭」及「設太監、陵戶看守」，實在未有執行。就致祭而言，如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遣內大臣伯索尼（?-1667）致祭前明崇禎帝」外，又「遣官祭前明成祖（朱棣，1360-1424，1403-1424在位）、仁宗（朱高熾，1378-1425，1424-1425在位）、宣宗（朱瞻基，1398-1435，1425-1435在位）、英宗（朱祁鎮，1427-1464，1435-1449及1457-1464在位）、憲宗（朱見深，1447-1487，1464-1487在位）、孝宗（朱祐樞，1470-1505，1487-1505在位）、武宗（朱厚照，1491-1521，1505-1521在位）、世宗（朱厚熜，1507-1566，1521-1566在位）、穆宗（朱載堉，1537-1572，1566-1572在位）、光宗（朱常洛，1585-1620，1620在位）、熹宗（朱由校，1605-1627，1620-1627在位）諸帝陵」，⁷⁰ 就沒有神宗陵在內。更直接的證

⁶⁷ 同上，卷一一，「順治元年十一月甲辰」條，頁109。按：春秋祭陵乃在順治二年（1645）開始。《北游錄·紀郵上》，「甲午（順治十一年）八月己未」條，頁68-69載「守思陵許公」語說：「順治二年，始春秋祭羊豕，凡十三陵，而定陵不與焉。各陵祭田六頃，奉祠太監二人，陵戶八人，順治六年裁，止田一頃，收纔十緡。」

⁶⁸ 多爾袞在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九日去世（《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五一，「順治七年十二月戊子」條，頁405），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福臨親政（同上，卷五二，「順治八年正月庚申」條，頁410）。

⁶⁹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五七，「順治八年六月辛未」條，頁457。

⁷⁰ 同上，卷一三〇，「順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條，頁1006。按：《世祖章皇帝實錄》僅載有祭崇禎帝文，惟《光緒昌平州志》卷一，〈皇德記〉，葉2上-下，及李鴻章（1823-1901）等修《畿輔通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2冊，卷八，〈宸章

據，還是福臨在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向禮部發出的諭，引錄如下：

聞明朝陵寢向所給守護內員、人戶、地畝數少，以致各陵祭品，備辦不敷，止於大紅門外總祭，殊於朕懷未愜。嗣後除萬歷陵不行致祭外，每年應春秋二次，太常寺差官致祭。⁷¹

由此可見，前此向明陵的春秋致祭，不過敷衍了事，而且定陵實不在致祭之列。

至於爲定陵「設太監、陵戶看守」一事，似亦徒具虛文。梁份就曾慨歎說：

今（定陵）門不加鑰，無司啟閉，芻者出入焉，牧者出入焉。天壽十一陵未有者，而定陵有之。⁷²

王源亦指出：

諸陵俱設太監一、陵戶三，各給地三十五畝，使守門鎖閉謁者，予陵戶錢方啟入，獨定陵不設，芻牧出入無禁。⁷³

誠然，清廷對待定陵，未免過於刻薄。

福臨雖透露入關初期「因神宗與我朝有嫌」而裁去定陵的守護和祭典，卻沒有提到殘毀定陵之事。又儘管此事一直在民間流傳，玄燁仍向諸皇子自誇先人「初進北京」時，對「明朝諸陵，一毫未動」。玄燁所言，是出於無知還是故意隱諱，不得而知。總之，清廷對毀陵之事隻字不提，直到乾隆（1736-1796）中葉以後，才公開承認有其事。而首揭此事者，竟是清高宗弘曆。

《乾隆朝上諭檔》載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的一篇奏疏，提到他們調查清初「平毀明神宗陵一事」，引錄如下：

查〈睿親王傳〉內於平毀明神宗陵一事，並未載有明文。惟恭閱《世祖章皇帝實錄》，於順治元年十一月載有明神宗陵不設看守陵戶之文；又於順治八年六月內載有神宗仍設陵戶上諭一道。臣等細加參核，復設陵戶係順治八年世祖章皇帝親政後所頒恩旨，則平毀神宗陵自係睿親王所為，與不設陵戶屬同時之事。⁷⁴

一），頁2-3，則同收入兩篇祭文。據兩志所收祭明諸陵文，亦沒有神宗在被祭之列。附帶指出，兩志所祭崇禎帝文，與《世祖章皇帝實錄》所載祭文完全不同，仿如另一篇不同時間的祭文。

⁷¹ 同上，卷一四一，「順治十七年九月丁丑」條，頁1084。

⁷² 《帝陵圖說》卷二，〈定陵〉，葉數缺。

⁷³ 〈十三陵記下〉，葉6下-7上。

⁷⁴ 《乾隆朝上諭檔》第7冊，「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條，頁193。

從奏疏的內容可見，弘曆下令調查清初平毀定陵一事，所以大臣翻查國史〈睿親王傳〉和《世祖章皇帝實錄》，從而推斷毀陵係多爾袞所為，而毀陵的時間為順治元年十一月。由此亦可見，當時乾隆君臣對毀陵之事不甚了解。如誰下令毀陵？陵毀於何時？他們都不知道。至於弘曆為什麼下令調查毀陵之事，上引奏疏沒有提及，仍有待稽考。

弘曆對軍機大臣的回奏似乎不大滿意，於是下旨他們「將睿親王緣事之處交國史館恭查《實錄》，採叙始末，繕寫清單」進呈。十一月二十九日，軍機大臣遵旨將「睿親王毀明神宗陵原奏片及恭抄《實錄》二條」進呈。可惜現時所見《乾隆朝上諭檔》，祇載有進呈奏疏，「原奏片」和「《實錄》二條」不見附錄。⁷⁵ 多爾袞到底用甚麼理由毀定陵，仍須再作考究。

乾隆五十年三月，弘曆下諭重修明陵。諭中交代了多爾袞毀定陵的原委。彙錄如下：

我朝開闢之初，睿親王以我師克取遼東時，明之君臣惑於形家謬說，疑金代（1115-1234）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然明樓、寶城仍存，其舊未壞也。維時我世祖尚未親政，其事寔由睿親王建議，亦非世祖意也。⁷⁶

然而，弘曆的說法，實難取信於人。因為後金克取遼東及明朝拆毀房山金陵，發生於天啓初年，與明神宗無關。題「聖祖仁皇帝御製」的〈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說：

金朝房山二陵，當我師克取遼陽，故明惑於形家之說，謂我朝發祥渤海，氣脈相關。天啟元年（1621），罷金陵祭祀。二年（1622），拆毀山陵，剷斷地脈。三年（1623），又建關廟於其地，為厭勝之術。⁷⁷

⁷⁵ 同上，第7冊，「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條，頁226。按：當時「一併進呈」的尚有「御製金陵碑文二道」，這兩篇碑文亦沒有附錄。又這兩篇碑文，即註77提到的兩篇〈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⁷⁶ 同上，第12冊，「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條，頁507。又見《高宗純皇帝實錄》第16冊，卷一二二六，「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寅」條，頁434。

⁷⁷ 〈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收入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第62冊，〈清二〉，「京九〇二五」，頁20。按：此碑漢、滿文合璧，碑末注：「康熙二年（1663）九月一日立」。弘曆所謂「聖人穹碑」（〈望大房山作歌〉，見氏著，《御製詩二集》〔收入《清高宗【原注：乾隆】御製詩文全集》第3冊〕，卷三九，葉3下，頁103），及其他人口中的

「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如《欽定日下舊聞考》第7冊，卷一三二，〈京畿·房山縣三〉，頁2122）、「聖祖仁皇帝御製金陵碑文」（詳本註下文）、「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如《光緒順天府志》第16冊，卷一二七，〈金石志一·御碑〉，頁6664），皆指此碑。然而，此碑既立於康熙二年，玄燁尚係孩童，立碑之事，當然不會是他的主意，碑文也不可能是他的作品。事實上，他的《御製文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內府刻本），亦未收入此碑文。

又按：碑文中指明朝拆毀金陵後在廢址之上建關帝廟，是因為明朝非常崇拜關羽（160-219），萬曆十八年（1590）加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萬曆四十八年（1614）更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盧湛〔集輯〕，《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嘉慶壬戌〔七年，1802〕江蘇寶蘇書局重刊本，〈歷代封號〉，葉1下-2上），希望藉此而得到關羽佑護，得享太平盛世。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下冊，〈關壯繆侯像贊〉，頁1735說：「惟壯繆侯，虎臣國士。王封帝號，崇我明祀。羯奴蛾賊，盜賊之靡。游魂未滅，惟帝之恥。都山鐵刀，東沸黑水。長沙銅柱，肅鎮南紀。陰護金繩，陽耀玉璽。佑我皇明，億萬年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錢謙益對關羽的期望，反映了晚明人的心態。有關明廷對關羽的崇祀，參看郭松義，〈試論明清時期的關羽崇拜〉，《中國史研究》1990.3：127-139；文廷海，〈論明清時期「關羽現象」的演變和發展〉，《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6：30-38；蔡東洲、文廷海，《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出版社，2001），頁155-171。

又按：關於明朝拆毀金陵的時間，福臨在順治十四年正月下諭修整金陵時，提出不同的說法：「明季國運衰微，因我朝克取遼東，誤疑金代陵寢旺氣相關，遂將陵後地脈掘斷。又因己巳年（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1629），我太宗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在位）統師入關，追念金代先德，特遣王、貝勒、大臣往陵致祭。乃故明復將陵前石柱等拆毀，建立關帝廟，鎮壓風水。」（《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〇六，「順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條，頁827。文中提到皇太極遣人祭陵之事，發生於己巳年十二月十一日〔1630.01.23〕，參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下冊，第12冊〔按：此為《滿文老檔》用語，猶言「卷一二」，下同，不一一注明〕，「天聰三年己巳十二月十一日辛酉」條，頁965-967；圖海〔？-1682〕等，《太宗文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卷五，「天聰三年十二月辛酉」條，頁82-83；阿桂等，《皇清開國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第341冊〕，卷一二，〈太宗文皇帝〉，葉30上-32上，頁186-187。但是三書都沒有記及明朝拆毀金陵之事。同年六月，福臨撰〈（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又將明毀金陵的始末，複述一次。儘管文字稍有出入，但內容並無不同（《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〇，「順治十四年六月己丑」條，頁861-862。此條實錄在載錄碑文前謂「建立金太祖、世宗陵碑」，《皇朝通典》卷四九，〈禮·吉九·祀·歷代帝王〉，頁2318及《皇朝文獻通考》卷一二〇，〈群廟考二·歷代帝王陵〉，頁5893-5894的說法相同。不過，《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本匯編》第61冊，〈清二·金太祖、世宗陵碑·京九〇二三〉，頁180收錄此碑，碑文漢、滿合璧，題作〈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碑文末注「順治十八年九月六日立」。既然碑文刻於順治十八年九月六日，亦即立於福臨身後，則此碑不應在順治十四年已立。《實錄》等書何以對立碑時間有異說，尚待考證）。

上引碑文的內容，弘曆是知道的。在他下諭重修明陵的同時，他寫〈謁明陵八韻〉一詩，詩中注說：

我朝修復金太祖（完顏阿骨打，1068-1123，1115-1123在位）、世宗（完顏雍，1123-1189，1161-1189在位）陵。聖祖御製碑文以前者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於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天啟初，拆毀金陵，斷斷地脈，又建關廟為壓勝之術。不思修德勤民，而移咎於異代陵寢，尤為舛謬。⁷⁸

上述兩種拆毀金陵的說法，當以康熙二年刻的〈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較為可信。由於此碑文後出，撰碑之時，不可能不知道福臨的論文和碑文的說法。加以兩碑樹立的時間相去不遠，清廷急於以年僅十歲的玄燁名義「御製」碑文，說不定就是發現舊碑有錯誤，藉此舉以正前碑之失。其次，弘曆在乾隆三十七年下諭查多爾袞「平毀明陵一事」時，大抵要軍機大臣兼查明朝拆毀金陵之事，否則他們不會在十月二十五日的覆奏中，報告前事的調查結果後，又說：「至明代殘毀房山金陵一事，遍檢《明史》等書，均未記載。恭查《世祖章皇帝實錄》於順治十四年，有御製金陵碑文一道。又康熙二年有聖祖仁皇帝御製金陵碑文一道，恭查《實錄》及《御製文集》內，未經載入。惟《房山縣志》內恭載碑文，文內叙明代折（拆）毀金陵，係天啓二年事。謹恭錄《實錄》二條，並御製碑文二道，一併進呈。」見《乾隆朝上諭檔》第7冊，頁193-194。從軍機大臣的覆奏可見，他們知道兩篇「御製金陵碑文」所載明朝拆毀金陵的經過有出入。同時在兩者之間，他們採納了「聖祖御製碑文」的說法，至於弘曆本人的取舍，相信亦與軍機大臣相同，因為當他記述明朝拆毀金陵的史事時，祇徵引「聖祖御製碑文」而已（詳正文）。

還要指出，這兩篇「御製」碑文在十六年後，再一次受到弘曆的關注。《乾隆朝上諭檔》第14冊，頁650載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四日的奏疏，引錄如下：「臣等謹將《日下舊聞考》所載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夾簽進呈。俟發下後，再行擬改呈覽，另為鐫刻。謹呈。」弘曆為甚麼要軍機大臣進呈兩篇碑文？奏中沒有清楚說明，但所謂「再行擬改」，「另為鐫刻」，無疑在說弘曆要修改碑文的內容。《乾隆朝上諭檔》第14冊，頁747另有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的奏疏，提供了此事的下文，再錄如下：「前蒙發下《日下舊聞考》一本，內聖祖〈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與世祖御製碑文，有詞句相同之處，令臣等酌改。今敬謹擬改，粘貼黃簽呈覽，伏候欽定。俟發下，臣等交武英殿改刊；并行知直隸總督，將原碑另行磨刻。謹奏。」由此奏所見，弘曆發現兩篇碑文「有詞句相同之處」，所以要去其同，而不是要統一兩碑文所載史事的差異。弘曆看過有關修改後，大抵隨即發還，所以「辦理軍機處」於當日便將「《日下舊聞考》所載原文，交武英殿遵照改刊」；又「將碑文前後改定之處，抄錄移咨」直隸總督，「即飭地方官遴選妥工，將原碑全文另行磨刻」，見《乾隆朝上諭檔》第14冊，「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條，頁748。透過上引奏疏和咨文，可見現時所見康熙二年碑及《欽定日下舊聞考》所載該碑文，並非原來筆致。

⁷⁸ 《御製詩五集》卷一四，葉2上-下，頁432。按：據書中編年，此詩作於乾隆五十年。《光緒昌平州志》卷一，〈皇德記〉，葉17上亦載有此詩，詩末注：「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季春月上澣」。換言之，此詩與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的重修明陵諭同時。不過，正

既然拆毀金陵乃天啓初年的事，弘曆在前引論中說多爾袞因此事而遷怒於定陵，「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實於理不合。事實上，弘曆可能自知犯駁，所以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作的〈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中，將明廷拆毀金陵的事，附錄在「德陵」題句之後，並指多爾袞為此曾向德陵報復。（詳下節）至於定陵因何被毀，弘曆沒有再提及。雖然是這樣，後世仍有明神宗因迷信而拆毀金陵的傳聞。⁷⁹ 追源溯始，未嘗不與弘曆的誤說有關。

文所引此詩的注文，其實已見於弘曆在乾隆十八年（1753）寫的〈望大房山作歌〉詩末（《御製詩二集》卷三九，葉3下-4上，頁103-104），祇是文字稍有不同而已。

⁷⁹ 明朝拆毀金陵一事，雖發生在天啓，但後人卻誤為萬曆朝之事。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冊，頁5說：「萬曆末年，明朝君臣認為滿洲稱後金，是金代後裔，其興盛與金代陵墓有關。金代的帝王陵墓在北京房山縣的大防（房）山，于是派人將金陵搗毀，以『斷其地脈』，『泄其王氣』。」楊仕、岳南，《風雪定陵》，頁237說得更是玄空：「萬曆見明軍已無力阻擋努爾哈赤（1559-1626，1616-1626在位）的鐵騎，卻通過太監找來陰陽術士王老七，施展陰陽之術，以破敵軍。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後，跪請皇帝說道：『女真人之北關，與其祖墳風水有關。如將房山金人陵寢搗毀，泄其王氣，明軍可能轉為勝矣。』萬曆皇帝聞聽此言，大為驚喜，努爾哈赤自稱『後金』，意為金人之後，于是諭令兵部急速派人趕往房山，搗毀金人陵寢。……明軍趕往房山金人陵區之後，大肆焚燒盜掘，整個陵區烈焰升騰，烟塵四起。不到兩個月，建築規模和歷史藝術價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遜色的房山金陵，毀壞殆盡。」此外，曹硯農，《古代帝王陵寢實錄》，頁113說：「在努爾哈赤起兵問鼎明朝而萬曆皇帝朱翊鈞手足無措的時況下，一班陰陽家、方士對朱翊鈞說：清軍的入侵與後金陵寢有關，清是金的後裔，故自稱後金。金代的陵寢在大房山，何不去大房山搗毀後金的陵墓，以泄其『王氣』。萬曆皇帝信以為真，果然派人到大房山毀陵。……當金陵被毀後，明朝皇帝還下令在陵園上建一座關帝廟，以鎮壓後金的『王氣』。」（長沙：岳麓出版社，1997）龐中威，《定陵發掘親歷記》，頁9亦說：「在朱翊鈞當政的時候，努爾哈赤在東北興起，點聚人馬，屢次南向。在戰場上明軍的節節失利，使得明代統治者感到惶恐。這時候，詭詐巧辯的陰陽家術士們對朱翊鈞說：清軍的入侵與陵寢有關，清是金代的後人，自稱後金。金代的陵寢在大房山，為甚麼不去大房山，毀掉他的陵寢，以泄他的『王氣』呢？昏庸至極的萬曆，真的聽信了這些話，把金代陵寢搗毀了。并且，還在上面建了一座關帝廟，以鎮壓他的『王氣』。」然而，諸書所言，皆無真憑實據足以取信於人，何況抄襲的痕跡所在多見。

其實，朱翊鈞未派人搗毀金陵，可從以下一事得到旁證。據顧大章（1576-1625），〈自敘刑曹事七條〉記載，「自天啓辛酉（元年）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姦細為事」。「兵部尚書張鶴鳴（1551-1635）奏……佟卜年（1588-1625）謀叛」。幾經審訊後，署刑部事的右侍郎楊東明（1548-1624）於天啓二年七月上疏，主張「宜誅」，其中一項罪名指言佟卜年「每歲拜金世宗墓」（見黃煜，《碧血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第7冊，卷上，葉19下-20

其實，定陵被毀的原因，民間早已流傳。前引梁份所謂「賊已破而七大恨之故，先雪怨于神廟」，並且附錄「七大恨原文」於《帝陵圖說·定陵》末，⁸⁰ 反映了部分清初士人的看法。

至於定陵被毀的時間，應該不是順治元年五月入關之時。⁸¹ 從上引《世祖章皇帝實錄》所見，順治元年七月、八月保護明陵的措施中，尚包括定陵在內。十月詔謂「明國諸陵，春秋致祭」，亦沒有說定陵除外。祇是到了十一月才明下定制，薄待定陵。由此看來，定陵的被毀，不會早於順治元年十月，軍機大臣推斷「平毀神宗陵自係睿親王所為，與不設陵戶屬同時之事」，是可取的。

(五)

雖然滿人入關時毀壞明十二陵之說純屬子虛烏有，但此說的其中一個論點——即定陵和德陵被焚燒，受破壞最甚——還須加以討論。事實上，雖有學者不提滿人毀壞十二陵之說，但力言滿人占領北京時焚毀定陵和德陵。⁸² 問題是，誠如前文指出，清初人不是已知「本朝入關，惟定陵被毀」而已，何以又有德陵被毀的傳聞？

從現存文獻所見，弘曆似乎是滿人入關時焚毀德陵說的倡導者。他的說法見於乾隆五十二年作的〈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上節指出，弘曆在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諭中，誤把滿人在入關後「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說成是多爾袞對天啓朝拆毀金陵的報復。可是，他在兩年後的〈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的

下，頁1302）。由此可見，金世宗陵並未毀於萬曆朝。有關佟卜年被誣一事，另參陳鼎（1605-？），《東林列傳》（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5冊），卷三，〈顧大章傳〉，葉18下-19上，頁192-194；錢謙益，〈陝西按察司副使贈太僕寺卿顧公墓誌銘〉，《牧齋初學集》中冊，卷五〇，頁1286-1287；〈明故山東登萊監軍道按察司佟公墓誌銘〉，《牧齋有學集》中冊，卷二九，頁1082-1083。

⁸⁰ 《帝陵圖說》卷二，葉數缺。

⁸¹ 胡漢生，《明十三陵大觀·明十三陵陵寢建置表·清順治元年》，頁240說：「五月，清兵入京，焚定陵碑亭，撤定陵享殿。」表中「文獻出處」注謂：「《帝陵圖說》；光緒《昌平州志》卷一。」惟遍讀二書，皆不見有確指其事發生在順治元年五月的記載。因此，相信「順治元年五月」這個日子，不過是作者根據某些內容推測出來，不是有甚麼真憑實據。按：胡氏在《明十三陵·明十三陵大事年表》（2004），頁191亦有「順治元年五月，清兵入京，焚定陵碑亭，撤定陵享殿」之說，惟未注資料來源。

⁸² 伯驊，〈清毀明陵小考〉，頁113。

「定陵」題句中，對多爾袞毀壞定陵之事，隻字不提。相反地，在「德陵」題句中，卻謂「睿王報怨以直爲，聞其明樓被焚毀」。弘曆在題句後解釋說：

天啟昏懦，婦寺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不可殫述。最可鄙者，當我朝克取遼東，彼乃惑於形家之說，疑房山金代諸陵，與本朝王氣相關，遂行拆毀，剷斷地脉。又建關廟於其地，以爲厭勝，實屬乖謬。……迨我師入定燕京，相傳睿親王以尼堪外蘭（?-1586）之釁，焚燬德陵明樓、享殿。夫修怨復仇，臣子之通義，在睿親王自當以直報怨，非爲己甚。但今閱百數十年，德怨久泯。昨因修復明陵，仍命將天啟德陵所有明樓、廡殿，一律興造，俾還舊觀。此則以德報怨，尤爲自古所無，非以睿親王爲之己甚而反其轍，蓋在我寧失之過厚耳。⁸³

於是，弘曆這首詩，就成爲多爾袞入定燕京後焚毀德陵的罪證。⁸⁴

可是，弘曆這則解說，疑點甚多，根本不值得相信。第一，弘曆說多爾袞「以尼堪外蘭之釁，焚燬德陵明樓、享殿」乃得自傳聞，但這個傳聞不合情理。因爲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被明軍所殺，乃萬曆朝之事，多爾袞理應向定陵報復此仇，而不應將矛頭指向德陵。因此，弘曆此詩所言，與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諭旨多爾袞因報復天啓朝拆毀金陵而焚毀定陵，同樣有乖常理。第二，弘曆爲何在兩年前的論文中，祇說多爾袞焚毀定陵，不提德陵亦遭焚毀？爲何在此詩中，卻說德陵被毀，反不提及定陵？是否他在兩年前不知道德陵被毀之事，到作此詩時才聽到傳聞？第三，如果多爾袞因爲要復仇而焚毀定陵和德陵，何以清初祇是停了定陵的祭祀，而仍舊祭祀德陵？何以獨在定陵門「不加鑰，無司啓閉」，任由芻者和牧者出入，而在德陵的寢門則如其他陵寢一樣，「加鑰司啓閉」，⁸⁵予以保護？

其實要知道多爾袞入燕京時有否焚毀德陵，並不困難，祇要翻開清初謁陵者的記載，便可找出答案。例如，顧炎武就沒有提及德陵曾遭受焚燒，在他筆下，

⁸³ 《御製詩五集》卷三二，葉32-33上，頁768-769。按：所謂「尼堪外蘭之釁」，乃指萬曆十年（1582），建州女真蘇克素護（一作蘇克蘇濟）河圖倫城主尼堪外蘭，誘明軍攻打建州右衛古勒寨城主阿太（?-1582，亦作阿泰、阿台），致令當時在城內的覺昌安（?-1582，努爾哈赤的祖父）和塔克世（?-1582，努爾哈赤的父親），同阿太一起被殺。參看《皇清開國方略》卷一，〈太祖高皇帝〉，葉1上-2下，頁25-26。

⁸⁴ 伯驊，〈清毀明陵小考〉，頁113。

⁸⁵ 《帝陵圖說》卷二，〈德陵〉，葉數缺。

德陵的模樣是這樣的：

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自永陵碑亭前分北為德陵神路。陵西南向，碑亭前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景陵。平刻龍鳳，殿柱飾以金蓮，殿無後門。榜曰德陵，碑曰「大明熹宗愍皇帝之陵」。樹亡，凡殿樓門亭俱黃瓦。⁸⁶

由此可見，德陵並無火災的痕跡。況且，顧炎武既清楚指出康、昭、定陵曾遭火劫，如果德陵曾遭焚毀，他沒有理由諱言其事。更重要的是，弘曆說德陵的享殿和明樓被多爾袞焚毀，而顧炎武說「殿樓門亭俱黃瓦」，顯示它們仍然存在。

梁份對德陵享殿和明樓的狀況，有較詳細的描述。他說：

裱恩殿（即享殿）黃屋（當作「黃瓦」）朱扉重簷，正西南向庚，額曰「裱恩殿」。殿五楹，柱朴素，無雕鏤采篆，制則如獻陵而不崇高、不堅緻。湫隘狹小，效獻陵過之。固創始之苟且，抑營構而後無後（「後」字衍）踵舊增新，以至此乎？殿內不置門。殿後北為門三道，又北石坊，又北石供，案上置石供器。殿東一百六十四跬寶城。……

明樓踞寶城上，城臺環短垣，樓高聳，黃頂琉璃瓦，橫檻高甍，重簷四出，制如獻陵。樓西面方位向庚，額曰「德陵」。中樹穹碑，龍首方趺，大書曰「大明熹宗愍皇帝之陵」。⁸⁷

當然，這不是說德陵毫無損壞，如梁份亦指出裱恩門「棟桷今欲崩折」，⁸⁸但情況並不嚴重；而且這些損壞不是因為焚燒所造成，而是日久失修的結果。

弘曆在乾隆五十年春天到過明陵，看見明陵「多有損壞」。他說：

朕此行幸湯山，取道昌平，躬詣長陵致奠。見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神牌龕案亦遺失無存，為之慨然弗忍視。⁸⁹

前引〈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說他「命將天啓德陵所有明樓、廡殿」，與其他明陵「一律興造，俾還舊觀」，證明德陵的明樓和享殿在乾隆後期確已殘闕不堪。梁份謁陵之時為康熙四十二年，下距弘曆致奠長陵八十多年。弘曆所指德陵明樓

⁸⁶ 《昌平山水記》卷上，頁9。

⁸⁷ 《帝陵圖說》卷二，〈德陵〉，葉數缺。

⁸⁸ 同上。

⁸⁹ 《乾隆朝上諭檔》第12冊，「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條，頁507。又見《高宗純皇帝實錄》第16冊，卷一二二六，「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寅」條，頁433。按：弘曆詣明陵一事，另參《御製詩五集》卷三〇，〈湯泉行宮即事〉，葉22下，頁731。

和享殿的損壞，自是這八十多年間的事，何況「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不獨德陵有此現象而已。同時，諸陵寢之所以損壞，神牌龕案之所以遺失，弘曆本人原有解說。就陵寢損壞言，弘曆歸咎地方官保護不周：

順治年間，因明陵附近居民於陵旁樵採，曾奉諭旨禁止，并添設陵戶看守。數十年來，地方官並未小心稽查，以致殿宇損漏，牆垣欹側之處甚多。⁹⁰至於神牌龕案遺失，弘曆歸罪附近居民盜竊：

即今雖為（原注：去聲）禁樵蘇，松栢鬱葱屋傾圮。屋圮猶可龕帳無，並其神主全失諸。尺木值幾亦盜去，汝祖獨非厥民乎！⁹¹

如果以上解說屬實，德陵明樓和享殿損壞的原因諒亦如此。

雖然多爾袞入定燕京時沒有焚毀德陵，但德陵在崇禎九年（1636）確曾被滿人所焚。弘曆的所謂傳聞，無疑誤將馮京作馬涼。崇德元年（即崇禎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皇太極命阿濟格（1605-1651）、巴泰等人率兵征明。⁹²在這次征明的過程中，他們曾焚德陵。此事不見錄於《滿文老檔》或其他清代官書，但在清初漢人的史著中，記載者則不少。如《國權》說：

（崇禎九年七月）己酉（初七日），建虜間道自天壽山後至昌平。降夷二千人內應，城陷。……焚天壽山德陵。⁹³

《明季北略》亦說：

丙子（崇禎九年）……七月……初八己酉，（清兵）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焚天壽山德陵。⁹⁴

但計六奇在計算日子方面有明顯的錯誤，因為崇禎九年七月初七日為己酉，初八日為庚戌。至彭孫貽《山中聞見錄》所載日子，又有出入：

崇禎九年七月乙巳（原注：初三），清人自柳溝間道迤白羊谷而西逾陵過昌平，番丁數千內應，噪而出與清兵合，城陷。……清人屯天壽山紅門中，焚德陵。⁹⁵

⁹⁰ 《乾隆朝上諭檔》第13冊，「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九日」條，頁730。

⁹¹ 《御製詩五集》卷一六，〈哀明陵三十韻〉，葉25下，頁478。

⁹² 《滿文老檔》下冊，第13冊，「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條，頁1485。《皇清開國方略》卷二二，〈太宗文皇帝〉，葉4上，頁325。

⁹³ 《國權》第6冊，卷九五，「丙子崇禎九年七月己酉」條，頁5747。

⁹⁴ 《明季北略》上冊，卷一二，〈清兵入塞〉，頁198-199。

⁹⁵ 彭孫貽，《山中聞見錄》，（收入《長白叢書·四集·先清史料》，長春：吉林文史出

清兵為何在十二陵中獨焚德陵，諸書都沒有解說。如果推測他們是藉此報復天啓朝拆毀金陵之仇，相信會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管清人因何而毀陵，但其事與多爾袞無關。因為當時率師出征北京的是阿濟格，而多爾袞則領軍出征錦州、寧遠。七月十四日，皇太極還遣人「齎敕往諭出征錦州、寧遠」的多爾袞，告訴他阿濟格的戰績，包括攻陷昌平的經過。⁹⁶因此，焚毀德陵絕非多爾袞的主意。

雖然德陵受到創傷，但在清兵撤退後，明朝的官員竟諱言其事，僅以陵寢遇到災異上聞。《烈皇小識》說：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陵寢裡殿，盡行拆毀。北兵退後，督撫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將陵寢裡殿，盡行吹壞。」有旨：「即著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反敍功加恩。三新參俱加太子太保，薊督丁魁楚（?-1647）戴罪管事，蘇撫吳阿衡（?-1638）供職如故。⁹⁷

德陵於何時修理完畢，無明文可考。據《國榷》記載：

（崇禎十年閏四月），禮部請預定謁陵大典，命俟十三年行之。⁹⁸

但所謁之陵，有可能是德陵，亦可能是皇陵，因為流賊在崇禎八年正月「陷鳳

版社，1990），〈一·建州〉，頁68。

⁹⁶ 《滿文老檔》下冊，第28冊，「崇德元年九月十四日」條，頁1596-1597。

⁹⁷ 《烈皇小識》卷四，頁122。按：李遜之，《三朝野記》卷六，葉10下-11上，頁149-150亦載有此事，雖不及《烈皇小識》詳細，但說明「新科三參」為「句容孔貞運（1619年進士）、江夏賀逢聖（1616年進士）、南海黃士俊（1607年進士）」（道光四年〔1824〕李兆洛〔1769-1841〕活字印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第438冊）。據《明史》第2冊，卷二三，〈本紀二三·莊烈帝一〉，頁320：「（崇禎九年六月）甲申，吏部侍郎孔貞運、禮部尚書賀逢聖、黃士俊，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學士，預機務。」又按：文秉指：「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陵寢裡殿，盡行拆毀」；李遜之亦謂：「北兵入至天壽山，將諸陵寢殿拆毀」。但清人所毀者，僅德陵一處而已。崇禎九年七月十一日，給事中王家彥（?-1644）以「陵寢震驚，樞臣（兵部尚書張鳳翼，?-1629）坐視「不救，上疏彈劾張氏」。王家彥，〈請劾樞臣疏〉中說：「據巡關御史王肇坤（?-1629）塘報，本月初七日，寇於七孔橋劄三大營，德陵起火，延燒房屋。次日復稱，本夜只見陵內火光，不知的實焚毀何處。」（見氏著，《王忠瑞公文集》〔順治十六年刊本〕，卷四，葉40上-下）由此可見，除德陵外，其餘陵寢未受損毀。其次，清人是焚燒德陵，而不是將它拆毀。有關王家彥彈劾張鳳翼一事，另參《明史》第22冊，卷二五七，〈列傳一四五·張鳳翼〉，頁6635。

⁹⁸ 《國榷》第6冊，卷九六，「丁丑崇禎十年閏四月己亥」條，頁5779。

陽」時，亦曾「焚皇陵樓殿」。⁹⁹ 皇陵的修葺工作在崇禎八年冬天肇興，¹⁰⁰ 竣工的時間尚待考定。但是，誠如論者指出，當時流賊起事此伏彼起，對明朝威脅極大，朱由檢是不可能遠離北京，往鳳陽拜謁皇陵的。¹⁰¹ 因此，所謂「謁陵大典」，當指「謁德陵大典」，而之所以有此大典，相信是為慶祝德陵修理完成。

關於陵工的完成，《國權》和《崇禎實錄》同有以下一則記載：

（崇禎十二年九月），敍陵殿功，賞內外官有差。¹⁰²

可惜兩書都沒有說明所指的是那一陵。無論如何，皇陵的修復工程，必在崇禎十四年（1641）四月朱由檢派官察勘皇陵之前完成。¹⁰³ 至於德陵的修復工程，亦必早於明亡以前完成，否則前述清初謁陵者筆下，不會沒有德陵損毀待修的記載。

（六）

流賊焚毀十二陵一事，不過為一項失實的傳聞，卻廣泛載錄在明末清初的史籍中，包括膾炙人口的《國權》、《石匱書後集》、《明季北略》等書在內。由

⁹⁹ 《明史》第2冊，卷二三，〈本紀二三·莊烈帝一〉，頁318。按：《明史》提及此事次數甚多，不煩多舉例。但其中第23冊，卷二七八，〈列傳一六四·朱大典傳〉，頁7059說：「（崇禎）八年二月，流賊陷鳳陽，毀皇陵」，誤。

¹⁰⁰ 楊士聰（1597-1648），《玉堂薈記》（《嘉業堂叢書》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75冊），卷一，葉14下-15上，頁174-175。

¹⁰¹ 胡漢生，《明十三陵大觀》，頁160。

¹⁰² 《國權》第6冊，卷九七，「己卯崇禎十二年九月丙子」條，頁5849。《崇禎實錄》卷一二，「崇禎十二年九月己亥」條，葉8上，頁369。按：該九月無己亥日，疑為乙亥之誤。但乙亥為二十一日，丙子為二十二日，如上述推論正確，兩書記此事相差一日。

¹⁰³ 崇禎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檢因南京孝陵附近被人開窖取石，傷損樹木，派勳戚三人，「會同奉祀及守備神官監、禮部、禮科」等官員前往察勘，並且命令他們「行至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併嚴行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參奏治罪」。同行的禮部侍郎蔣德璟（?-1646）撰有〈察勘皇陵記〉。如果當時因流賊破壞而進行的皇陵修理工程尚未完竣，朱由檢必會命令諸臣順便監察工程及回報進度，但蔣德璟完全沒有提及皇陵修理工程之事，顯見工程已經在早前完成。〈察勘皇陵記〉收入孫承澤（1592-1676），《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下冊，卷四〇，〈陵園·附載〉，頁560-562；又見《春明夢餘錄》（《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本，光緒七年〔1881〕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內本重刊），卷七〇，〈陵園·附載〉，葉18上-33下。此外，孫承澤在下列兩書亦記載遣官勘察皇陵一事：《思陵典禮記》（《惜月山房彙鈔》本，上海：博古齋，1920），卷三，頁10下-12下；《山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四，〈遣官察陵〉，頁354-355。

此可見，不論其作者如何具有良史之才，其書如何具有史學價值，但過往留存下來的史事委實太多，作者不可能逐一審訂。異說紛紜的史事，容易惹人注目，自然特別用心；眾口一詞的說法，則易為人忽略，人云亦云，在所難免。於是書中史實與誤說並存，以訛傳訛的記載，不一而足，作者本身固未能察覺，而讀者亦難於分辨。如是這般，流賊焚毀十二陵的訛傳，至今流傳不已。

顧炎武、屈大均、趙吉士、黃百家、梁份、王源諸人都到過明陵，他們的記載固足以否定流賊焚毀十二陵的傳聞，但他們所述明陵的損壞情況，出入竟如此之大，實出人意表。例如，有人說三陵被焚毀，有人說兩陵被焚毀，有人卻說祇有定陵遭殃而已。即使同是定陵，有人說全毀，有人卻強調明樓、寶城未壞。在上述諸人中，梁份對明陵的損壞情形，記載最為詳細，但他始終交代不清這些損壞如何造成。從前引《帝陵圖說》的文字所見，我們除了知道他認為康陵和昭陵的明樓為流賊焚毀、昭陵的享殿因火災而燒毀、定陵的碑亭等建築物為清人搗毀，便不能確定他認為其餘建築物毀壞的原因。例如，他雖說定陵的享殿毀於「甲申之變」，但指的是流賊所為？還是清人所為？抑或兩者兼而有之？便不好理解。當然，梁份的解說不一定可靠，顧炎武不是說過定陵「尚存宰牲亭，暨外諸監房」嗎？梁份所見神宮監、宰牲亭、祠祭署的倒塌，顯然是顧炎武謁陵以後發生的，與清人入關時毀陵無關。最後，定陵既先後毀於流賊與清人，謁陵者如何判斷那一部分損毀的元兇是誰？梁份言詞的含糊，其實反映他不能確定誰是元兇。由此可知，顧炎武所謂定陵「殿廡門為賊所焚」，屈大均所謂「定陵全毀於賊」，亦不外是想當然的推論而已。

以上諸人記載明陵損壞的目的，原在於報導親自目睹的事情，理應沒有作偽的意圖，恐怕他們也不會想到自己的記載原來存有不少疑問。至於萬經曾否訪陵，不可確考。不過，他提出「止昭、定二陵」遭毀之說，除欲報導史事外，更在糾正傳聞之失。遺憾的是，經過他「核之」後的報導，仍然不是事實，相信這也出於他意料之外。

弘曆身為滿族君王，沒有理由誣衊其祖先，他筆下清人殘毀明陵的說法應該最具權威，其記載本無容置疑，且容易為人取信。如天啓初年，明朝因迷信風水而拆毀金陵，弘曆誤以為萬曆之事，并附會多爾袞入關後為報復此事而殘毀定陵，便為學者徵引。¹⁰⁴ 後世關於萬曆帝因迷信風水而拆毀金陵的傳聞，或亦由

¹⁰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冊，頁5。

此而來。此外，弘曆又有多爾袞「以尼堪外蘭之釁，焚燬德陵明樓、享殿」之說。此說未見於弘曆以前的文獻。姑不論弘曆之時真的有此傳聞，抑或其說本出於弘曆的臆測而委之於傳聞，他沒有查證便輕率立論，其目的不外乎借他指多爾袞的「以直報怨」（為祖先復仇而殘毀明陵），標榜自己「尤為自古所無」的「以德報怨」（不念舊惡而修復明陵）。可是，多爾袞便因此而蒙受了二百多年不白之冤。諷刺的是，這項失實的「傳聞」，竟然成為近人筆下德陵非為流賊所壞的翻案證據。¹⁰⁵

至於近人著作中明十三陵被流賊和清人殘毀的傳聞，內容陳陳相因，字裏行間，抄襲的痕跡清晰可見，加以它們都沒有注明史料來源，分明不是嚴肅的著作。其次，這些傳聞顯然互相排斥。如果明陵已被流賊破壞殆盡，清人入關後就不必再次搗毀了。何況，這些傳聞本來便有明顯的破綻。因為當流賊攻陷昌平時，朱由檢尚在生；清人入關時，思陵尚未營造。當時祇有十二陵，未有「十三陵」。因此，祇要稍為留意史事的時序，便會知道所謂流賊或清人殘毀十三陵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儘管論者可以說「十三陵」之稱固未夠精確，但無礙於陵區的整體指示。可是，一陵之差別，其實反映了著述者對歷史的認識是否準確及其撰作態度是否認真。全祖望說：「郢書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¹⁰⁶我們對流賊與清人殘毀十三陵的訛傳，固然不能掉以輕心。但問題是，如此犯駁的傳聞，何以竟能在凡事講求嚴謹、追求翔實的史學領域內不幸而傳？

（本文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¹⁰⁵ 伯駢，〈清毀明陵小考〉，頁113。

¹⁰⁶ 《結埼亭集》上冊，卷三五，〈周甓堂事辨誣〉，頁67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崇禎實錄》，嘉業堂藏鈔本影印本，《明實錄附錄》之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

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

文秉，《烈皇小識》，與《研堂見聞雜錄》合刊，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6。

王家彥，《王忠瑞公文集》，順治十六年（1659）刊本。

王源，《居業堂文集》，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讀雪山房藏板本。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

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

（題）吳偉業，《鹿樵紀聞》，與《揚州十日記》等書合刊，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6。

吳履福等，《光緒昌平州志》，一九三九年重刊光緒己卯（五年，1879）重修，丙戌（十二年，1886）刊成本。

-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刻本影印本，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000。
- 李遜之，《三朝野記》，道光四年（1824）李兆洛活字印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李鴻章等，《畿輔通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 沈嘉轍、吳焯、厲鶚等，《南宋雜事詩》，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周家楣等，《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 阿桂等，《皇清開國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 查慎行，《人海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 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夏燮，《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孫承澤，《山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 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 孫承澤，《思陵典禮記》，《借月山房彙鈔》本，上海：博古齋，1920。
-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本，光緒七年（1881）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內本重刊。
- 徐鼎，《小腆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張岱，《石匱書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梁份，《帝陵圖說》，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
- 清世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
- 清高宗，《清高宗〔原注：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 清聖祖，《御製文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內府刻本。

- 許重熙，《明季甲乙彙編》，收入《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史部·晚明史料二種》，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
- 陳鼎，《東林列傳》，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
- 嵇璜等，《皇朝文獻通考》，收入《十通》，臺北：新興書局，1965。
- 嵇璜等，《皇朝通典》，收入《十通》。
- 彭孫貽，《山中聞見錄》，收入《長白叢書·四集·先清史料》，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 彭孫貽，《平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彭孫貽，《流寇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 馮夢龍（輯），《甲申紀事》，收入《馮夢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題）馮夢龍原本、莫釐山人增補，《燕都日記》，與《青燐屑》合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 黃宗羲（編），《明文授讀》，康熙三十六年（1697）張錫琨味芹堂刻本影印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黃煜，《碧血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
- 楊士聰，《玉堂薈記》，《嘉業堂叢書》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 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
- 鄒漪，《明季遺聞》，北京圖書館藏順治（1644-1661）刻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
- 圖海等，《太宗文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
- 趙士錦，《甲申紀事》，與《紀事略》等書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 趙吉士，《萬青閣自訂詩》，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青閣全集》清刻本。
- 劉若愚，《酌中志》，道光乙巳（二十五年，1845）《海山仙館叢書》本。
- 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
- 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

盧湛（彙輯），《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嘉慶壬戌（七年，1802）江蘇寶蘇書局重刊本。

錢軾，《甲申傳信錄》，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戴笠、吳旻，《懷陵流寇始終錄》，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錢氏述古堂抄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

懶道人，《李闖小史》，與《甲申核真略》等書合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與《京東考古錄》合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二、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

1990 《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

文廷海

1999 〈論明清時期「關羽現象」的演變和發展〉，《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6：30-38。

王德恒

1999 《北京的皇陵與王墳》，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

王謙

2001 〈明定陵發掘紀實〉，《黨史天地》2001.1：20-23。

史松、林鐵鈞

1985 《清史編年》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伯驊

1996 〈清毀明陵小考〉，收入燕山出版社（編），《京華古迹尋踪》，北京：燕山出版社，頁111-114。

沈嘉榮

1994 《顧炎武論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汪宗衍

1970 《屈翁山先生年譜》，澳門：于今書屋。

何冠彪

來新夏

- 1983 《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柳義南

- 1983 《李自成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
1986 《李自成新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漢生

- 1993 《明十三陵大觀》，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8 《明十三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0 〈清乾隆年間修葺明十三陵遺址考證——兼論各陵明樓、殿廡原有形制〉，收入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首屆明代帝王陵寢研討會、首屆居庸關長城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64-72。
2004 《明十三陵》，鄭州：大象出版社。

孫文良、張杰

- 1994 《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蕩》，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秦佩珩

- 1962 〈《鹿樵紀聞》的作者及內容問題〉，《學術研究》1982.5：102。

商傳

- 1978 《明十三陵》，北京：北京出版社。

曹硯農

- 1997 《古代帝王陵寢實錄》，長沙：岳麓出版社。

郭松義

- 1990 〈試論明清時期的關羽崇拜〉，《中國史研究》1990.3：127-139。

陳懷仁、夏玉潤

- 2000 〈試析明皇陵的特點〉，收入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首屆明代帝王陵寢研討會、首屆居庸關長城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24-29。

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

- 1993 《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馮其庸、葉君遠

- 1990 〈吳偉業《鹿樵紀聞》辨偽〉，附錄於氏著，《吳梅村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578-589。

楊仕、岳南

- 1991 《風雪定陵——地下玄宮洞開之謎》，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1 《風雪定陵——地下玄宮洞開之謎》（修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劉仁甫

1915 《前明十三陵始末記》，刊本。

蔡東洲、文廷海

2001 《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出版社。

龍顧山人（郭則澐）

2000 《十朝詩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謝伏琛、方福仁

1983 〈《流寇志》與《平寇志》〉，收入彭孫貽，《流寇志·代前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1-9。

謝國楨

1981 《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謝敏聰

1979 《中國歷代帝王陵寢考略》（修訂再版本），臺北：正中書局。

龐中威

2002 《定陵發掘親歷記》，北京：學苑出版社。

顧誠

1984 《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egendary Destruction of the Ming Tombs by the Peasant Rebels and the Manchus

Koon-piu Ho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ccording to many private historical works published in early Ch'ing, the peasant rebels were accused of having set fire to the Ming Tombs in 1644 on their way to invade Pek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also legends described how the Manchus further destroyed the Ming Tombs soon after they took over the rule of China. Such legendary incidents are still prevalent in modern historical writings, even though some contemporary scholars began to cast doubt on their credibility. Some contemporary scholars argue that only the Ting-ling (Tomb of Emperor Wan-li) had been burned down by the rebels; others even allege that the rebels had not ignited flame on any Ming Tombs at all. As for the role of the Manchus, a rather common ground in serious scholarship is that the Manchus had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 Ting-ling and the Te-ling (Tomb of Emperor Tien-ch'i). This article, however, demonstrates that at the material times the rebels had in reality cremated three Ming Tombs, whereas the Manchus were on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flammation of the Ting-ling. The Manchus did kindle a destructive fire on the Te-ling, but it was in 1636, eight years before they began to rule China.

Keywords: liu-tse (wandering bandits), Ming Tombs, Ting-ling (Tomb of Emperor Wan-li), Te-ling (Tomb of Emperor Tien-ch'i), Dorgon